



容 閔

—中国留学生之父

李喜所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新保
封面设计：邓汝燧

22-2

8

ISBN7-5434-0582-2
G·473 定价：3.45元

容 閔

——中国留学生之父

李 喜 所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容闳（1828—1912年），中国第一代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19岁，漂洋过海，到美国求学。22岁，考入耶鲁大学，毕业后归国。重教育，办实业，辗转英、法、美等国。坎坷的一生，奋斗的一生。

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

李 喜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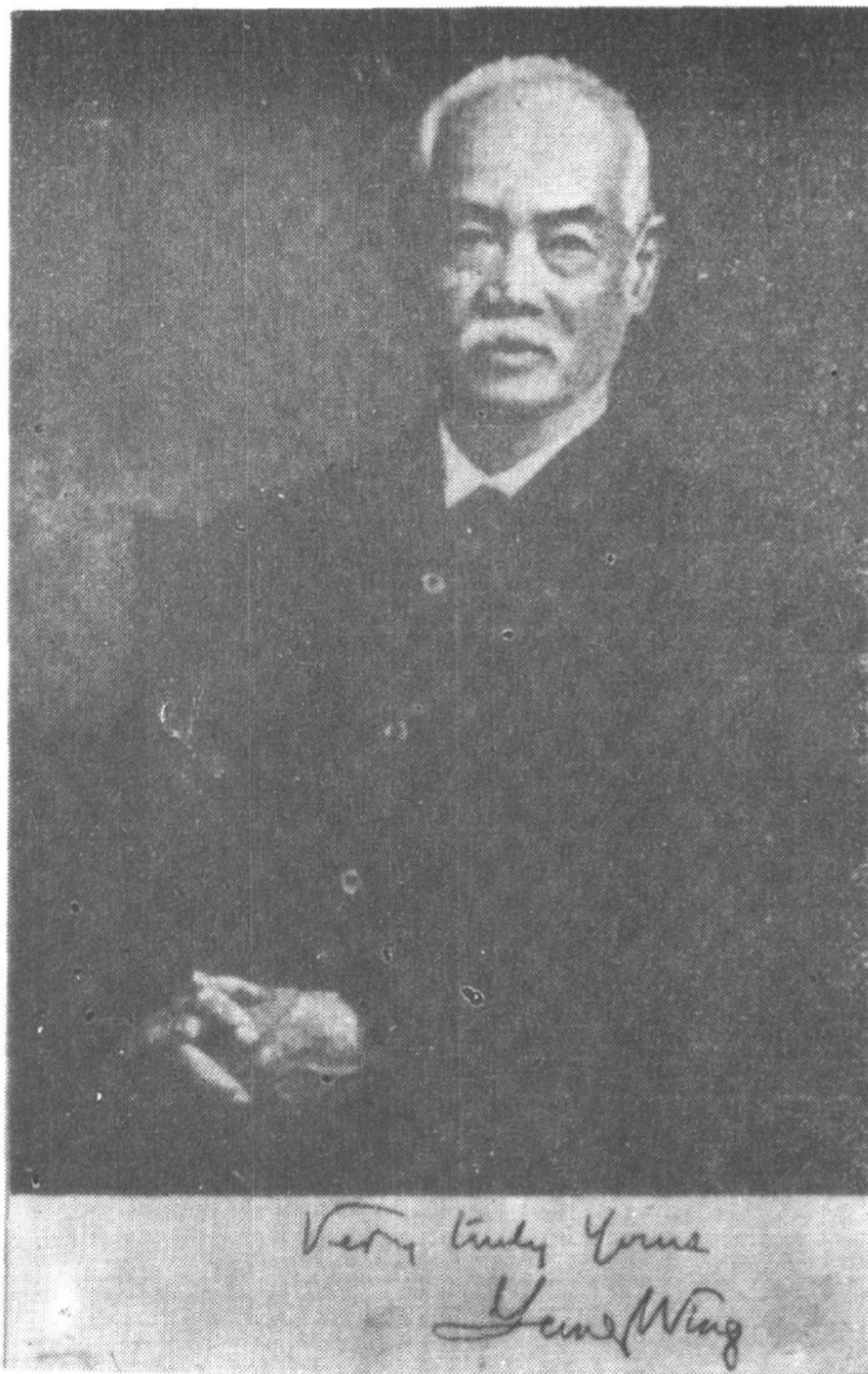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唐山市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7.75印张 160,000字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 定价：3.4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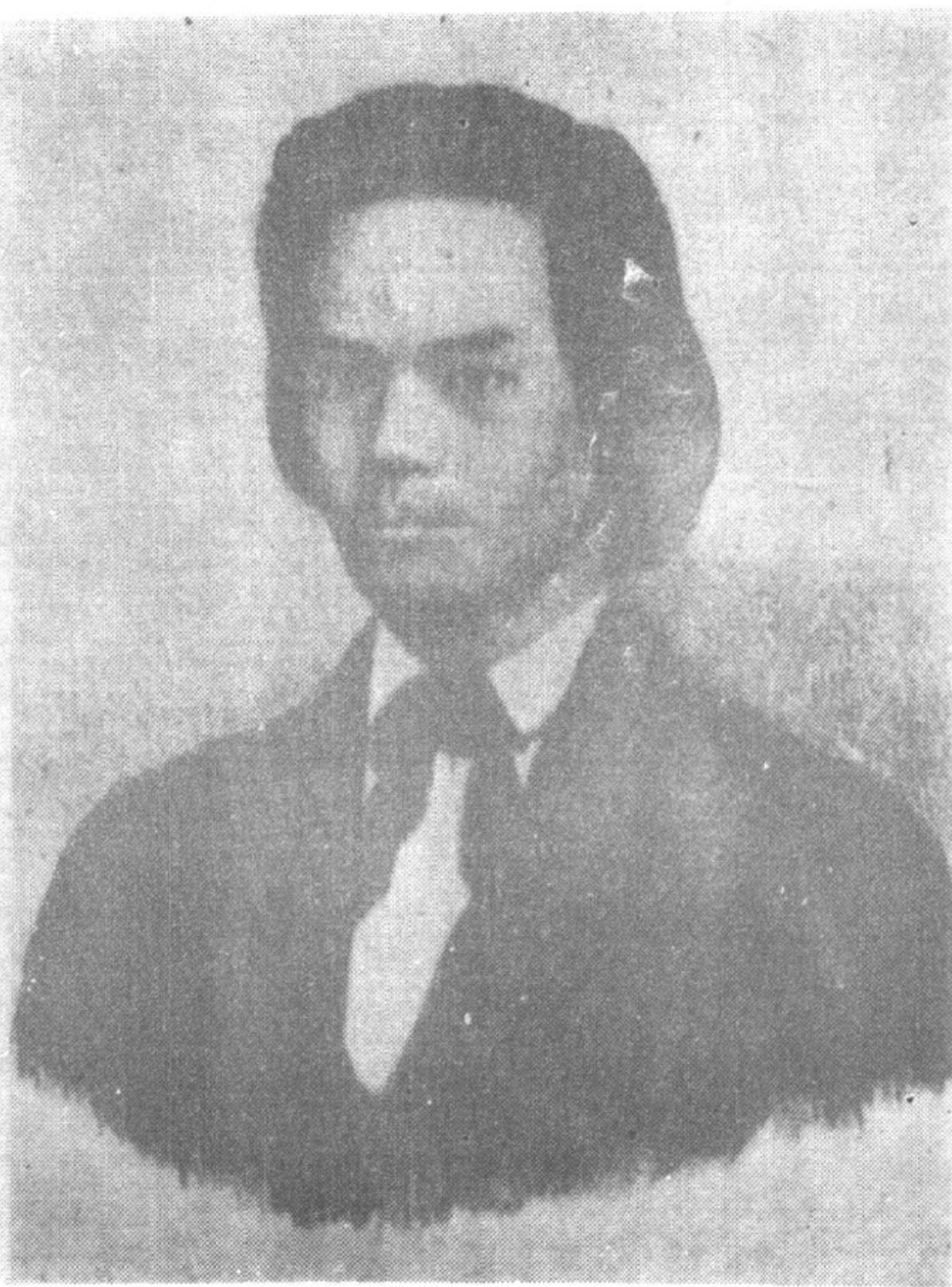
ISBN7-5434-0582-2/G·4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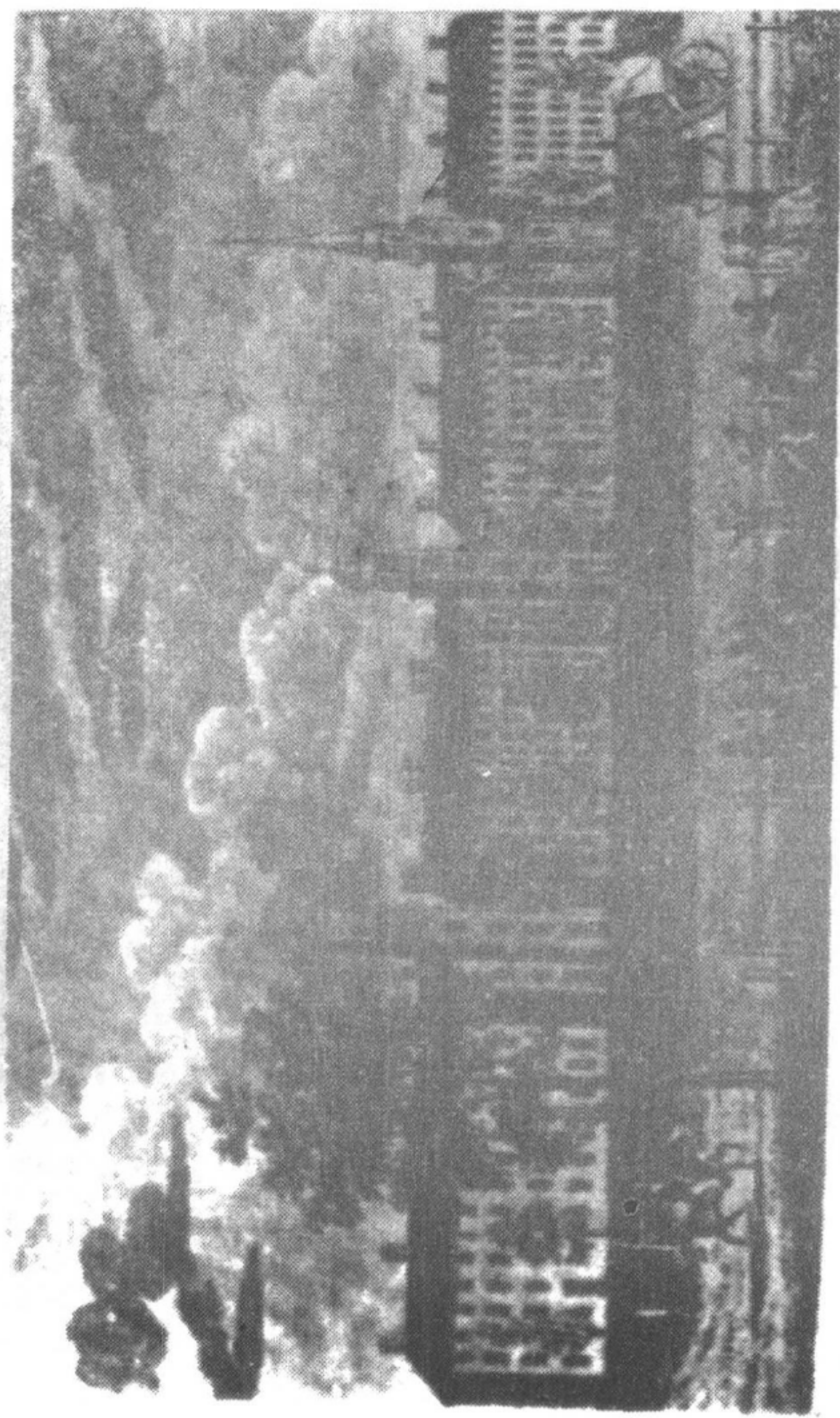


容闳亲笔签名（英文）的照片

1780100/05

在耶魯大學畢業時的容閔





19世纪初期的耶鲁大学（版面）

June 26/1953.

There is 有 the gate
 a morning 朝 4.1. morning
 and 有 the morning
 a day 日 4.2.
 then first 初 the night
 even 旦 4.3. morning
 full 下 the flower.
 we only 何 4.4. at present
 seen 凡 4.5.
 the morning 日 4.6.
 but 何 4.7.
 inside the 何 4.8. the one
 flower 何 4.9. information
 the 何 4.10. to the other
 Yang Ming

to 何 4.11. the gate
 morning 何 4.12. the gate
 the 何 4.13. the gate
 9. 何 4.14. the gate
 had 何 4.15. the gate
 I just more more forget the
 heart he had when a child.

May 11th 1953

Yang Ming

Yang Ming

END (-1-1-1)

容因一八五三年的手迹

To Cash paid Expenses for all
 for 1864-5 \$ 3346.20
 Mackins travelling Expens. 2845.18
 12 months Salary 5000.00
 add \$157 Passages for paper & \$ 11191.38
 Shanghai 20 & September 1865
 11341.58
 Young Wing

容闳赴美采购机器时写的支销单



30名第一批赴美幼童合影（1872年摄）

具甘結人詹興洪今與具甘結事茲有子天佑
願送赴

憲局帶往花旗國肄業學習機藝而文之一日聽從中
國差遣不得在外國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
天命此結是實

童男詹天佑年十二歲年申西園白麻州自營
縣人氏

會祖文賢

祖世德

父興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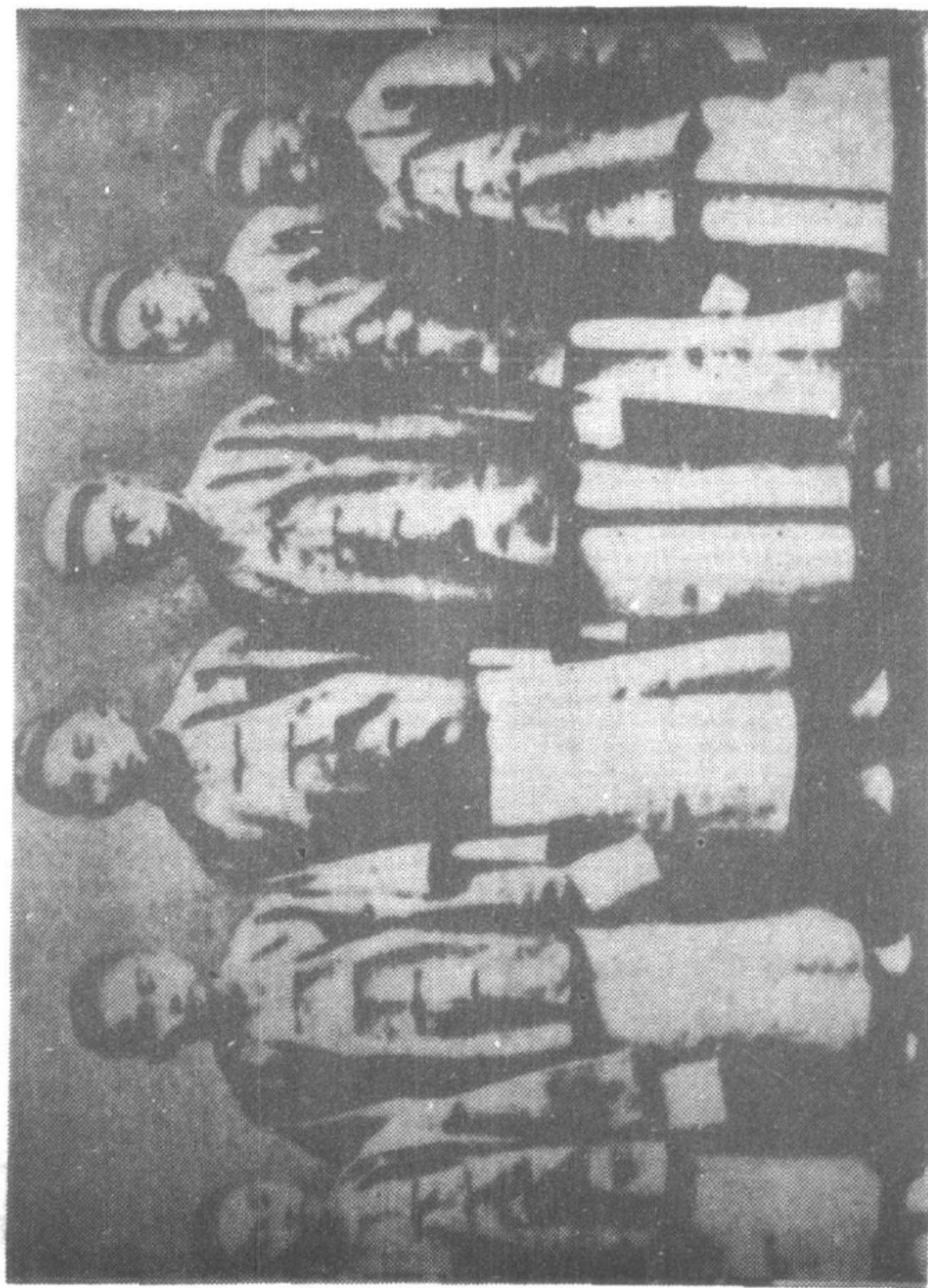
同治十一年

三月

十五日

詹興洪的筆跡

詹天佑出國時立下的具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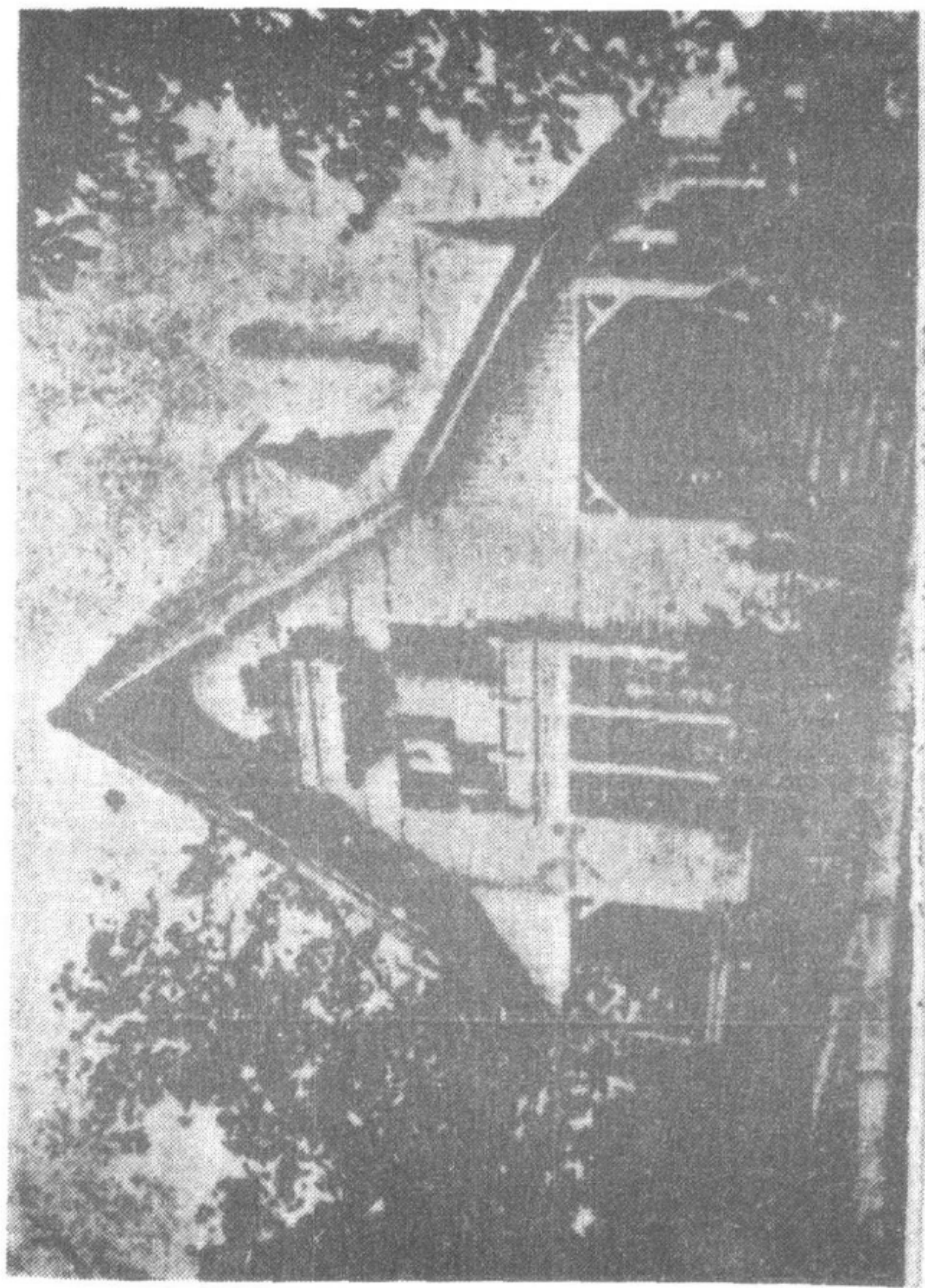


6名留美幼童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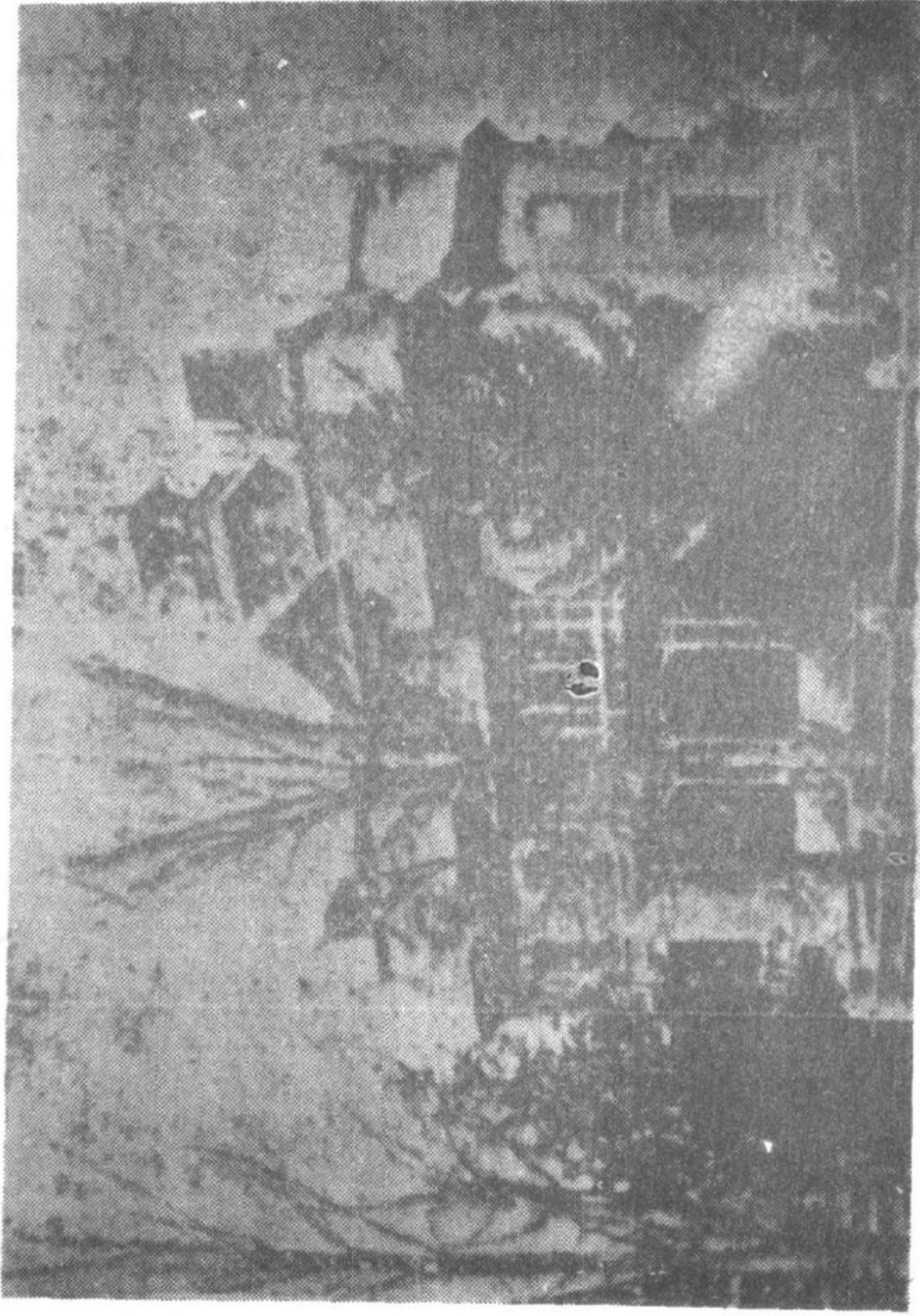


Jeme Tien-yow, (left) 12 years old, and his
classmate Pan Ming-chung after arriving in
Connecticut in 1872.

詹天佑（左）与潘铭钟合影



留美幼童在美住过的地方——春旧镇



中国留学生事务所（在美国）



留美组织的棒球队



容闳夫人 **Mary Kelleggy**
(1875年结婚时摄)



译为中文的容闳自传
——西学东渐记



容 閔 墓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BY

YUNG WING, A.B., LL.D. (YALE)

COMMISSIONER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ASSOCIATE CHINESE MINISTER IN WASHINGTON,
AND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IN



NEW YORK
HENRY HOET AND COMPANY
1909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CHAPTER I

BOYHOOD

I was born on the 17th of November, 1838, in the village of Nam Ping (South Screen) which is about four miles southwest of the Portuguese Colony of Macao, and is situated on Pedro Island lying west of Macao, from which it is separated by a channel of half a mile wide.

I was one of a family of four children. A brother was the eldest, a sister came next, I was the third, and another brother was the fourth and the youngest of the group. I am the only survivor of them all.

As early as 1834, an English lady, Mrs. Gutzlaff, wife of the Rev. Charles Gutzlaff, a missionary to China, came to Macao an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London for the promotion of female education in India and the East, immediately took up the

容闳用英文写的自传
(1909年在纽约出版)

序 言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是李喜所同志的新作《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喜所同志差不多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在红旗下长大，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崭露头角，成为著名的史坛新秀。我认识喜所同志只有16个年头，但就是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喜所同志充分发挥自己业务扎实、思维敏捷、文笔流畅等优势，对交织着屈辱与抗争、黑暗与光明的近代中国历史，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锲而不舍，探幽索隐，取得丰硕成果，撰写出多达100万字的论著，赢得了诸多学人的赞许。

《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是喜所同志继《谭嗣同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而推出的又一部传记性专著。传主容闳生活在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的时代，一面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交相为恶，一面是中国进步力量千辛万苦的学习西方、推进近代化。容闳作为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的坎坷而带有悲剧性的一生活活动，始终是围绕着

“西学东渐”这个中心进行的。他以自己的精神和实践，为“西学东渐”铺下了路基，并为祖国赢得了荣誉。早在1881年一位英国友人就曾指出：“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对于这样一位热爱祖国、埋骨异域的重要历史人物，长期以来，不仅很少给予公允的评价，而且研究的成果也寥寥无几。喜所同志以勇于开拓的精神，怀着为近代化事业追踪探源的激情，决意为之立传，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了这部专著。喜所同志在《后记》中说：“为容闳立传，我主要注意了两点：一、力求客观公允，用可靠的资料和史实去‘说话’，戒带感情色彩，秉公直书；二、试图从广阔的近代社会背景和中美社会文化的大环境中去揭示容闳的个性和演进规律，将人与社会沟通起来。”通观全书，令人欣慰，喜所同志的愿望基本上实现了。喜所同志以信而有证的史料，对传主一生中重大的有代表性的事迹，条分缕析，精细描摹，重在写事，寓评论于叙事之中，较准确地反映了传主的基本风貌，并进而揭示出传主个性的形成和命运的变迁同社会的潮流、时代的特点以及当时人际关系的内在联系；同时还摒弃了繁琐的引证，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逼真，有很大的可读性。稍感不足的是，对传主尚缺少立体透视，个别论断也似欠精当。

容闳已矣，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尚未成功。喜所同志的新作，有助于人们学习先驱，启迪来者，堪称合乎时代需要的佳品。

苑书义

1988年6月于石家庄太行山麓

目 录

一、前言——从一种特殊现象谈起	(1)
二、从提篮小卖到留学美国	(6)
1. 生不逢时	(6)
2. 坎坷的童年	(10)
3. 在马礼逊学校	(15)
4. 沟通中美文化的先驱	(18)
5. 扬帆赴美	(24)
6. 容闳的两名同学	(29)
7. 留学耶鲁大学	(33)
8. 西学东渐思想的形成	(37)
9. 开风气之先	(42)
三、为西学东渐奔忙	(47)
1. 返回祖国	(47)
2. 活动于广州、香港	(52)
3. 奔波于上海	(56)
4. 寄希望于太平天国	(67)
5. 侧身商界	(79)
6. 偶遇曾国藩	(88)

7. 赴美采购机器·····	(95)
四、终于实施的留学教育计划 ·····	(100)
1. 上书清廷·····	(100)
2. 如愿以偿·····	(104)
3. 选派留学生的困难·····	(110)
4. 幼童横渡太平洋·····	(115)
5. 一批新人的成长·····	(135)
6. 围绕留学生的斗争·····	(144)
7. “教育计划”的夭折·····	(150)
8. 詹天佑等人的贡献·····	(158)
9. 留美生的历史地位·····	(167)
五、投身社会改革 ·····	(172)
1. 无法改变的爱国心·····	(172)
2. 办银行·····	(178)
3. 修铁路·····	(184)
4. 插足戊戌变法·····	(188)
5. 组织中国国会·····	(193)
六、晚年的新探索 ·····	(198)
1. 转向革命·····	(198)
2. 支持反清斗争·····	(205)
3. 向往南京临时政府·····	(209)
4. 埋骨新大陆·····	(214)
5. 子继父志·····	(218)
七、结语——关于容闳的评价 ·····	(224)
附录：容闳活动纪年 ·····	(231)
后记 ·····	(243)

一、前言

——从一种特殊现象谈起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社会现象：

当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之前，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风云突起，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刘师培^①等无政府主义者都钻研和倡导“社会主义”，辛亥革命这样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却伴随着一阵“社会主义”的呐喊；当资产阶级还在胚胎时期，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改革者已经开始了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宣传，戊戌变法这样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竟看不出资产阶级有什么动静，冲杀在前的是一批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感染的从旧营垒中分化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甚至在20世纪初年，当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力宣传欧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并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时，那些和资本主义企业联系在一起的工厂主、资本家都较少响应，不少人甚至站在了革命的对立面，并不欢迎反映他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更奇

^① 刘师培，字申叔，江苏仪征人，生于1884年。20世纪初年，他力主反清，创办《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鼓吹读经尊孔。1920年病逝，后人曾编有《刘申叔先生遗书》。

怪的是，太平天国这样充分反映农民阶级政治、经济要求的大起义，居然出现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以致人们无法解释《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内在联系；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也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前进速度，往往走在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前面。近代的许多思想流派缺少抚育其成长的特定的经济、政治基础，兴起得早，衰亡得快，早熟，早亡，经济和政治发展对思想意识的决定性作用表现得不十分突出，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倒是思想理论的演变先于资本主义新经济和政治变革运动的勃兴。

这是为什么？

曰：西学东渐——思想引进。

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将世界联成了一片，闭关自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1840年悄悄到来的时候，英国资本主义列强用罪恶的大炮轰开了清朝政府紧闭的大门，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清政府卷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中国的封建传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从此，先进的中国人从保卫中华、振兴祖国的目的出发，开始了痛苦的思索。他们被迫走向世界，面对未来，去探讨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去引进西方世界五花八门的思想流派。这种引进虽然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客观需求，但总是有很多地方脱节。因为中国当时已经远远落在了飞速发展的欧美各国的后面，反映欧美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就必然会超越中国经济基础的变革速度，出现空中楼阁的特殊现象。

但是，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思想文化引进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既是必要的，也是及时的。它首先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初步解决了传统的封建理论在人们思想里逐步破产后出现的“学问饥荒”局面。随着这种思想文化引进的展开，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呼啸而来，许多中国人从未见过的科学、理论、教育、艺术等破土而出。属于自然科学方面的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物理、化学、生物、地质、天文、光学、机械、矿学等等新型学科开始出现了；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君主立宪”、议会、议院、宪法、民权、民生、天赋人权、自然哲学、进化论、社会学、新小说、新文体、新诗、西方绘画、新音乐、文明戏、新史学、新经济学、新管理学等等逐步为许多人所接受。总之，西方思想文化的引进，打破了封建旧文化的一统天下，在西学和中学的斗争中，新的资产阶级的文明萌芽和生长了。“赛先生”（Science 科学）和“德先生”（democracy 民主）这两位孪生兄弟被请到了中国，中国的传统观念在慢慢发生变化，和滚滚向前的世界潮流的距离在逐步缩小。

这种思想文化的引进在政治上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正是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人们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的生产力，才使中国的经济、阶级状况、思想认识发生了某些微小的新变化，封建专制大厦的墙角被挖开了；正是由于甲午战争前后维新知识分子对西学的大力宣传，才出现了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同样由于20世纪初年以留日青年为中心的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介绍，才导致了武昌起义的枪声；而1915年兴起的以“科学”和“民主”为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则直接为五四运动打下了基础；留法勤工俭学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改变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面

貌。由此我们可以说，如果不正确地分析和探讨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就不可能准确地认识中国近代史。

也正是因为西学东渐在中国近代有很大的进步性，所以和这一活动有联系或作出过贡献的人，我们都怀念他、尊敬他，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象洪仁玕^①，他不过是在香港住过六、七年，道听途说了一些资产阶级新东西，到南京后草写了一个《资政新篇》，但在历史家的笔下总要肯定他的启蒙性的功绩；再加严复^②，他在戊戌变法中表现并非突出，后来又是臭不可闻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但他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典籍，大体解决了一代人的精神食粮，人们还是将他列为先进的中国人；那个不懂外文的小说翻译家林纾^③，在政治上以清朝“遗老”自居，是个“复辟狂”，但他译述的西方小说曾对近代新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还是研究他、表彰他；还有王国维^④，是个政治

① 洪仁玕，字谦益（亦称益谦），广东花县人，1822年生，是洪秀全的族弟，1843年加入反清革命组织拜上帝会。1852年后流落香港，接触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1859年辗转到达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协助洪秀全处理太平天国政务。1864年为太平天国壮烈牺牲。

② 严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今闽侯）人，1854年生。早年就学于福州船政学堂，1877年往英国留学，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精神文明。1879年返国后，呼吁改革，参加戊戌变法，同时翻译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理论著作，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晚年，思想较保守。1921年病逝。

③ 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今闽侯）人，1852年生。曾任教于北京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翻译西方文学名著，成效甚大，但政治上守旧。1924年去世，有《畏庐文集》等传世。

④ 王国维，字静安，浙江海宁人，1877年生。曾往日本留学，对西方哲学、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皆有研究，受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影响很深。从1902年起，他主要从事于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学术上成果巨大，著作曾辑为《观堂集林》等。1927年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

落伍分子，但他的资产阶级哲学、史学思想，尤其是用资产阶级方法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整理，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凡此种种，为西学东渐推波助澜的人们是有历史功绩的，他们的客观历史地位也由此而确定。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生动记录，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写进历史，能被历史学家写上一笔的人毕竟太少了！只有那些把个人的活动和某一集团、某一阶层、某一阶级也就是多数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并代表了他们，尤其是反映和推动了历史前进步伐的人，才可能青史留名。我们将要作传的这位容闳，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个走向世界，第一个受到了完整系统的资产阶级教育，第一个取得学士、博士学位，第一个开始以选派留学生为中心的西学东渐。容闳，原名光照，族名达萌，号纯甫，又作纯父、纯圃、淳甫、春浦、纯斋等。他一生谋求中国进步，有着独特的贡献，被人们誉为输入西方思想文化的拓荒者和中国留学教育的奠基人。因此，较详细而准确地探讨容闳艰苦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从而在一个角度了解中国留学生教育的复杂历史以及近代西学东渐——思想引进的内在特点和规律，便是十分必要的。

二、从提篮小卖到留学美国

1. 生不逢时

在我国南海沿岸镶嵌着许多晶莹夺目的宝岛，位于澳门西面的婆罗岛就是其中的一个。1828年11月17日（道光八年十月十一日），容闳就出生在这个岛上的南屏村。

南屏村原名沙尾。康熙初年清政府为了扼制郑成功在台湾的抗清活动，在沿海实行大规模的迁界政策，沙尾也被迁入内地，后来随着台湾抗清力量的破灭，沿海村庄又陆续迁回，南屏村是迁回后才逐步使用的名字。南屏村在婆罗岛的北边，背靠将军山，座落于沿海的小平原，距香山县城（今中山县石岐镇）125里，距要塞前山寨14里。这里气候湿润，物产丰盛。稻麦棉麻、牛羊鱼虾、瓜果梨桃，无所不有；务农、打鱼、制盐、放牧，全可为生。多少年来人们就在这里开垦耕牧，休养生息，用血汗改变着南屏村的一山一水，使风景优美的南屏村逐步变成了南海之滨的鱼米之乡。有两首描写这一带风景的诗中写道：“稻香秋雨后，蚕语夜声稀”；

“牧童村外笛，驱犊下黄昏”。^①这简直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图。

容闳的祖上自宋朝嘉定年间（宋宁宗赵扩的年号，1208——1224）从广东省新会县迁居这里以后，世代和这里的人们并肩劳动。容闳的父亲容丙炎是一位朴实厚道、聪明能干的庄稼人，料理着容闳一家的生计。容闳的母亲林氏，是个纯朴的农村妇女，勤老干练，任劳任怨。容闳的哥哥容光杰，比容闳大六岁，当容闳记事时已进入私塾读书。此外，容闳还有一姐一弟。容家六口人，虽然生活在这鱼米之乡，但劳动果实大都被地主、官吏掠夺了去，过着衣食无余的苦寒日子。随着日月的流逝，容家生活不但毫无起色，而且每况愈下。当容闳开始认识人世的时候，映入其眼帘的不仅有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而且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巧取豪夺。

容闳出生的1828年正是道光八年，这是清朝衰败的年代。清朝在康熙时虽然一时强盛，但自嘉庆以后就明显衰落。道光皇帝是收拾嘉庆皇帝的烂摊子，自他即位以来，清政府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都一蹶不振。

这时的清政府吏治败坏，贪污成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忙于勾心斗角，结党营私，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为大府（指总督、巡抚）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②为了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清政府在经济上加紧对农民的压榨。官方文书上虽然写着“永不加赋”，实际上年年加捐，巧立名目的各种杂税多如牛毛。而

① 申良翰：《香山县志》卷八。

② 《张謇全集》卷三，第24页。

且从乾隆、嘉庆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家有万顷田地的地主到处出现，无田耕种的农民与日俱增，“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①清朝的军队有八九十万，但到道光年间已腐烂不堪。许多军官花天酒地，夜间宿娼，白天经商，军事训练一概变为具文。清朝的“文字狱”是骇人听闻的，许多知识分子在这种残酷压制下不敢谈论政治，而只把读书当作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很多人不是变作不学无术的庸人，就是成为寡廉鲜耻的官迷。有人讽刺这些人说：“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②”？

清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对人民这样的残酷统治，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官逼民反，各地的农民起义连续发生，就是在容闳的家乡香山县也时常出现农民的反抗斗争。1810年南屏村的海面上一股农民起义队伍出没往来，时常袭击清朝官军，曾一度抢到清朝副将罗凤山的巡海船。^③1824年香山县三合会起义，遍及全县乡村，“独濠头与榄边圩数处不入。”^④1827年黄秉云等发动起义，与地方士绅激战。1832年香山县天地会首领张斗率数百人起义。

清政府除了内忧，还有外患，嘉庆、道光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猖狂而来。远在1557年，离南屏村几里远的澳门就被葡萄牙殖民者强占。1575年西班牙的商船首次来华，1601

① 《丁役议》，《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户政五。

② 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

③ （光绪）《香山县志》卷二十二。

④ 历式金：《香山县志续编》卷十四。

年荷兰殖民者第一次到广州要求“通商”，1637年英国的商船到达广州城外，1698年法国的商船来到中国。随后，这些国家的牧师、商人、亡命徒为了发财致富，纷纷涌向中国，连鸦片烟箱也偷偷运来，在南屏村东面的伶仃洋里，数不清的鸦片商船风帆待发，大批毒品向中国倾销。这些殖民主义者还在沿海一带霸占田产，枪杀人命。据《香山县志》所载：1828年英人要在东望洋山一带修驰道，建炮台，占去农民田地，还勒令将坟墓迁出，如若不从，“弃残骸于海”。同年，一传教士无故杀死澳门的严亚照，一英人借取乐枪杀一卖糖果者，一妇女在洋人家当佣人被逼上吊自杀。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持鸟枪蹂躏场圃，……阑入村庄，蛋船有少女，或强宿焉。”^①

这些殖民主义者在进行政治威胁、经济掠夺的同时，还十分注意文化侵略，开医院，办学校，培养中国人作传教士，扶植为他们服务的洋奴买办。1834年，英国伦敦妇女会准备在澳门办学，由传教士郭士立的夫人(Mrs. Gutzlaff)负责筹办，很快办起了一所小学，专招中国女生入学。后来，殖民主义者还在澳门办医院，印书报，借以进行奴化宣传。这样，容闳的家乡不仅是遭受西方殖民者政治经济侵略最早的地区，而且也是受西方奴化思想毒害较深的地方。

内有封建贪官压迫剥削，外有殖民强盗横征暴敛，容闳幼年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

① (光绪)《香山县志》卷二十二。

2. 坎坷的童年

1835年，容闳7岁，应该背起书包进学校读书了。但就容闳的家庭状况来看，进校读书是有困难的。容闳家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其哥已经进入私塾读书，家庭重担全落在了容闳父亲的身上。如果容闳再进校读书，不仅增加了其父的负担，而且容家度日会更艰难。但是，作父母的总是希望儿子有所造就，千方百计要为儿子安排一个锦绣前程。容闳的父亲不仅下决心要让容闳读书，而且在究竟让容闳进什么样的学校上绞尽了脑汁。按照封建社会的传统，小孩子要先进私塾读书，然后考秀才，中举人，金榜题名点状元，升官发财，耀祖光宗。但容闳的父亲并不希望容闳走这条道路。近十几年来，容闳父看到那些在洋人门下办事的翻译、通事、商人、地主，有钱有势，只要略通“洋务”，能说会道，善于钻营，转眼间“千金赤手可致”，^①变为富翁，这使他十分眼馋。于是，容闳父亲为容闳选择了走经营“洋务”、将来当一翻译或商人这样的道路，决定送容闳进教会学校读书。十分清楚，容闳父亲的如意算盘是：让容闳的哥哥进私塾读书，将来升官发财；让容闳进教会学校学习，将来发家致富；两个儿子只要有一个成功，容家即有钱有势，出人头地。这种思想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在东南沿海加深的产物，也是南屏村一带已开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沉沦的反映。

^① 转引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一期。

恰好在1835年初澳门的郭士立教会小学增设了男生部，招收中国学生。这所小学之所以要设立男生部，主要是为了纪念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功绩”。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基督教圣经的中文最早翻译者，英国伦敦会教会中国分会的创始人，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鼻祖。1782年他出生于英国诺森伯兰(Norfolk-berland)，1798年加入长老会，从1804年开始入教士传习所学习，专习中文、医学、天文，准备来中国传教。1807年他渡过大西洋到纽约，然后由太平洋往中国，9月7日抵广州，后又移住澳门。他一面在这一带传教、翻译圣经，一面又兼作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中文通译员。当时清政府禁止外国人传教，马礼逊被驱逐，遂跑到马六甲，继续吸引中国人作信徒，并翻译圣经和编《华英字典》。1810年他将翻译的一些圣经偷偷带往广州印刷，认识了刻字工人梁发，并收梁作基督教徒。后来梁发附会这些圣经自编了一本《劝世良言》，后竟被洪秀全利用来发动太平天国革命。1823年，马礼逊将新旧约全部译为中文，共21卷，在马六甲出版。1826年他再次来广州传教。1834年8月1日死于中国。马礼逊死后，传教士们大肆吹捧他的传教“精神”，纷纷要求组织马礼逊教育会和建立马礼逊学校来表彰他的“丰功”。1835年1月26日，澳门出现了许多这样的传单。于是就在郭士立教会小学中设立男生部，作为将来建立马礼逊学校的预备。

然而，即使是传教士们为了培养教徒办的学校，没有一点门道也是很难进去的。正好容闳同村有一个人在郭士立小学任司事，此人并和容闳的父亲有交情，通过这个人的关

系，容闳被批准入学。

1835年盛夏的一天，容闳的父亲拉着容闳来到郭士立小学，郭士立夫人前来接收。容闳虽然从小见过不少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但从未见过西方妇女，加上郭士立夫人个子高，眼睛凹，头发“混乱”，态度严肃，容闳一见即惊，钻在其父肘下，不敢动弹一步。容闳父亲见此情景，未免怜悯难舍，但为了儿子将来有钱有势，忍心将容闳留下了。

郭士立小学管理极严，学生稍不听话，动则训斥棒责，而且男女生严格分开，女生被关在三层楼上，未经许可不能随便下楼。容闳在男生中年龄最小，怕其他男生欺负他，郭士立夫人将他放在三层楼上的女生中。这犹如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关进了牢笼，容闳日夜想家，心神不定，尤其当他看到楼下的男孩子们作游戏，放风筝，他更难忍受。因此，他经常潜下楼去，和男孩们玩耍，甚至偷出校外，往大街游逛。一天，他突然看见一个小码头停泊着数只小船，不觉计上心头。他速返楼内，串联了六个年岁大、胆子壮的女同学，密谋雇一只小船，逃回家中。第二天一早，郭士立夫人正在吃饭，七人乘机逃往码头，雇就一只小船，急速向南屏村划去。容闳兴高采烈，告其他六人先往他家住几天，再各回其家。六人欣然同意，乐在眉梢。不一会儿，南屏村已遥遥在望，七人拍手欢呼。突然后面一只船飞快追来。容闳知道不好，催船夫加速前进。但追船已到，七人被抓回。郭士立夫人怒不可遏，命七人排队在校内游街，晚上又让七人立在桌上，容闳居中，头戴高帽，胸挂大牌，上书逃徒，完全视他们为越狱的囚犯。郭士立夫人还让全校学生排队参观，

并当场发给参观的学生橙子果饼，容闳虽然馋涎欲滴，羞愧难堪，但仍不服气，足足立了一小时，头也不回。

从此以后，容闳再不敢逃学，每天无聊地读圣经，背英文，几年后会说几句英国话。但没等容闳结业，郭士立教会小学因经费等原因停办了。郭士立夫人为了培养传教徒，带三名盲女回国，同时也喜欢容闳聪明好学、性格倔强，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一名传教士，她临走时特意嘱咐在澳门行医的传教士霍白生（Dr. Hobson）在将来马礼逊学校正式开学时，招容闳入学。

容闳回到南屏村后，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劳动，不觉已12岁了。然而就在这时，厄运向他袭来。

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开进伶仃洋，进攻广州，和广州邻近的南屏村也处于硝烟之中，饱受战争创伤。战火未灭，9月17日容闳的父亲与世长辞了。容家顶梁柱夭折，生活极度困难。容闳回忆当时的情况说：“迨1840年夏秋之交，方鸦片战争剧烈时，适予父逝世。身后萧条，家无担石，予等兄弟姊妹四人，三人年齿稍长，能博微资，予兄业渔，予姊躬操井臼，予亦来往于本乡及邻镇之间，贩卖糖果，兢兢业业，不敢视为儿戏。每日清晨三时起，至晚上六时始归，日获银币两角五分，悉以奉母，所得无多，仅仅小补，家中搆柱，惟长兄是赖耳。予母得予等臂助，尚能勉强度日。如是者五阅月，而严冬忽至，店铺咸停制糖果，予乃不得已而改业，随老农后，芸草阡陌间，予姊

恒与予偕。”^①

这样近似流浪儿的生活，左右邻舍的许多老农至为同情。一天，容闳和其姐往田里捡稻穗，休息时有位老农招呼他们过来。

老农开口说：“小孩，听说你会讲红毛儿人的话，讲几句吧！”

容闳不好意思，低头不语。其姐一旁怂恿，容闳仍不作声。

“老头儿我从未听过洋话，你如果能讲几句让我听听，我给你好几捆稻谷，让你背也背不动。”

老农的这句话打动了容闳，他张口便道：“A、B、C、D……。”

26个字母刚背完，老头儿喜笑颜开，随便拿几捆稻谷送给了容闳。容闳姐弟谁也背不动，急忙回家叫了几个人一块背走了。

然而容闳幼小的心灵中不是在感激老农的慷慨帮助，而是欣赏自己会说英语的才能。从此，他更注重于英语的学习。容闳会讲英语的消息也很快在南屏村传开了。

有一天，容闳邻居有一位在澳门天主教办的印刷书报厂当工人的大哥请假归来，来容家串门儿，偶然谈到该厂要招收一批童工，折叠书页，只要认识英文字母和号码就行，容闳母亲建议介绍容闳前去，这位大哥欣然答应。没过几天，通知容闳快来报到。于是容闳二次来到澳门，作起了印刷书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以下凡未注明版本者，均据此书），第4—5页。

报厂的工人。

当时，童工的工资极低，每月只有四元五角钱，但容闳还拿出三元寄给老母。这样艰苦的生活持续了四个多月。忽然有一天容闳收到一封来信，署名霍白生，要容闳前去见他。容闳在郭士立小学读书时，就认识霍白生，霍白生办的医院就在印刷书报厂的旁边，休息时容闳忙去求见。霍白生告诉他马礼逊学校已在1839年11月1日开课，要他入学。但有一个条件，必须跟霍白生一起在医院住几个月，经过严密考察之后，方准入学。容闳当时求知欲甚强，急忙回家说服老母，又往印刷书报厂辞职，投奔于霍白生的门下。此后容闳天天跟在霍白生之后杵臼丁丁，制药膏丸散，霍白生出外巡医，则背着沉重的药箱东走西奔。这样的生活过了两个多月，霍白生见他勤快听话，将他送进了马礼逊学校。时为1841年。

3. 在马礼逊学校

马礼逊学校当时的校务主持人是美国传教士布朗(Rew. S. R. Brown)先生。他18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获博士学位，1839年和其夫人来到澳门，着手办起了马礼逊学校。1840年已招收中国学生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等人。学校主要上英文、地理、算术、中文等课。容闳由于学习用功，加上在郭士立小学已学过英语等课，成绩总是名列第一，博得了布朗先生的赏识。一位外国人记述容闳当时的情况说：“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

人们把他送到学校来，布朗先生认为他是一位有前途的学生，把他收下。这位小孩的母亲很贫穷，靠上山打柴过日子。她的意思是让这孩子在学校里多呆些时候，学点英文知识，将来好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当仆人。”^①

1842年8月，鸦片战争结束，英国通过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去了香港，马礼逊学校由澳门迁到了香港的一座小山上，招生也扩大为40多人，分三班上课。布朗先生一时照顾不过来，又增聘几位传教士来马礼逊学校任教。

从1841到1846年，容闳一直在马礼逊学校读书。六年的学习生活不仅使他增长了知识，会讲流利的英语，而且在思想上潜移默化，向往美国。他对美国老师崇拜之至，非常敬佩布朗先生。他认为“布先生一望而知为自立之人，性情态度，沉静自若，遇事调处，秩序井然，其为人和蔼可亲，温然有礼，日常操乐观主义，不厌不倦，故与学生之感情甚佳。其讲授教课，殆别具天才，不须远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②容闳这样一个度日艰难的流浪儿被传教士收来过上正常的学校生活，他从心里当然充满着感激之情，所以他根本看不到传教士们进行侵略活动的另一面。而且马礼逊学校天天向学生灌输资本主义世界如何美妙，传教事业如何神圣，上帝如何普度众生，这使容闳逐步产生了外国优于中国的思想，他日夜憧憬着西方各国，尤其想亲眼看一下美国是何等富强。布朗先生曾给他们出过一道作文题叫《意想之纽约游》，容闳在这篇作文中用全部想象，大赞了纽约“天

① 参见H·N·Shore: 《The Flight of the Lapwing》。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9—10页。

堂”般的生活。

1846年冬，布朗因身体不好，准备回美国去。为了培养传教士，他想带几名中国学生同去。临行前四个月，他向全体学生讲道：

“我由于身体不好，准备暂时离华，但我对马礼逊学校和同学们感情极深。这次归国，很想带三、五名同学同赴新大陆，以受完全之教育。诸位如有愿意同行者，起立！”

学生中一片沉默，布朗扫兴归屋。

随布朗往美国，这是要离开家园，远走异国他乡，对于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讲，殊难同意。此后几天的课余活动中，学生们都相对无言。只有容闳、黄胜、黄宽三人，平时日夜盼望往美国一游，感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沾沾自喜。

又过了几天，布朗先生又进一步向学生讲了赴美的好处，最后说：“如有愿去者，起立！”

一人首先站起。同学们一看是容闳。接着又有两人起立，即黄宽、黄胜。布朗一看，面带笑容，命三人速回家说服父母，准备启程。

容闳兴冲冲地奔回家中，向母亲讲明情况，当场被拒绝。容母一来希望容闳在身边做事，分担家务；二来对美国情况不明，怕出意外；三则出于母爱，不忍心离开；所以不会答应。然而受了多年西方资本主义教育的容闳，一方面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崇拜，渴望亲眼看看，一方面出于少年强烈的求知欲望，想出国学习。同时又把布朗先生当作恩师，所以非常想去。

小学生的心一旦飞了出去是很难收回来的。容闳一次不

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一连四次求母亲答应。其母内心痛苦，凄然泪下。容闳见此情景，虽然心中难受，但赴美心切，于是又婉言相劝：“母亲！儿虽远去，尚有兄、弟和姐三人，而且哥哥就要娶妻，马上即有兄嫂服侍您老，不会寂寞的，望您保重自己，不必牵挂于我，让我去吧。”最后，其母无奈，答应了容闳的要求。容闳高兴之至，立刻收拾行李，准备赴美。

4. 沟通中美文化的先驱

容闳能够赴美留学，不仅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而且后来对中国社会也有某种影响。他竟意外地成了沟通中美文化的先驱者。这是由当时特殊的中美之间的文化背景决定的。

在19世纪上半叶，古老的中国和年轻的美国彼此并不了解。

美国人何时知道中国，现在不得而知。但在美国抗英独立之前，中美没有任何直接往来，当时中国的茶叶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往伦敦再转运至美洲；美洲的人参等土产也是通过这种途径反运至中国的。美国独立后，从对抗英国和发展经济的目的出发，企求与中国贸易往来。但美国人关于中国的情况多是从一些旅行者及东印度公司的商人那里零星得到的，对中国存在着无知和偏见，认为中国人可笑又无法救药，是“长尾巴的天朝人”、“雨伞民族”、“未

开化的‘猪眼’人民。”^①这当然阻碍了美国人的来华步伐。

然而，美国人富有冒险精神，在1784年中美正式有贸易往来之前，极个别的商人、游客、海盗曾来华探险。据可信的史料，至少黎亚德（John Ledyard）和一名姓戈尔（John Gore）的到过中国。黎亚德是美国康州（Connecticut）人，大学毕业后随英国人在太平洋各地探险，漫游过广州。返美后，讲述了中国的情况，但多数美国人不相信。不过，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世界上有个中国，商界的一些冒险分子还试图来中国做生意。于是，1784年2月22日，“中国女皇号”（Empress of China）轮船由纽约启航来华，8月23日抵中国，次年5月12日回到纽约。出乎意料的是，这次航行，几位商人大发横财，消息一下传遍了美国。有的议员还专门致信总统杰佛逊（Jams Madison），请重视和扩大中美贸易。1789到1791年，美国政府曾立法保护对华经济贸易。

中美贸易虽然打通了，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书刊却一本也没有，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仍处于茫然状态。1818年，杰佛逊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并表示特别想了解中国的语言文字。但由于种种条件限制，不能如愿。1825年，13岁的美国人亨特（Wiliam C. Hunter）来到中国，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攻读中文，后从事商业活动，能讲汉语和用中文写文章，这是真正懂汉语的第一个美国人。

^① 参见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86页。

但他并未撰写什么著作。1834年，美国商人出于好奇，从广东买了一名小脚妇女运至美国，美人争看“三寸金莲”，这对中国人是一种侮辱，也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风俗文化的无知。直到1838年，当时美国哲学会的会长杜彭书(Peter S. Du Ponceau)经过努力，才出版了一本《中国文字之性质及其特征》。但从全书看，他根本没读过中文书，资料来源于欧洲人的报告或著作，仅是生搬硬套的粗略介绍而已。比较有一定水平来介绍中国文化的是象布朗那样早期来华的传教士。

1829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h Bridgman)启程来华，途中遇到了亨特，亨特成了他的中文启蒙老师，这为裨治文在华活动提供了方便。他到广州后，一面行医，一面办起了英文期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介绍中国的文化典籍和人情事故，还翻译了一些中国私塾所用的课本，无疑成了美国和其他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不过，《中国丛报》所介绍的内容还是十分浅薄的，例如第十一期所刊的介绍《红楼梦》的文章，把此书归结为“琐碎无聊之谈”，把贾宝玉说成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实在是太荒唐了。但是，裨治文了解中国的热情很高，经过努力，他在1841年出版了《中国广东话注解文选》，长达七百余页，用英文、中文两种文字，简明而朴实地相互作注，对沟通中英语言文字有开拓之功。1842年，在裨治文的干预下，曾成立了美国东方协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研究中国，但没什么成果。不过在鸦片战争时期，裨治文是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出版的《广州市

及其商业介绍》，是美国人关于广州的拓荒作品。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较裨治文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他1833年来华，在美国公理会创办的印刷所当工人，学会了中文和日文，并注意搜集有关中国地理和历史的资料。1844年出版了《中国地志》，1848年又刊印了《中国总论》，除叙述中国地理分布外，还概括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历史、人口、民情、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等，附有“中华帝国地图”。与此同时，他曾返回美国作过一百多次演讲。后来他出版的《中文缀音字典》，收字12527个，对外国人学中文有很大功效。晚年，卫三畏被聘为美国耶鲁大学的中文教授，成为美国开讲中文课程的第一人。直到1879年，哈佛大学才通过特殊途径请了中国宁波一位叫戈鲲化的任中文讲师。《哈佛纪事》(Harvard Register) 记云：戈鲲化“是他所隶属的古老国家以及我们所属的新兴国家间的一种秘奥的联结”。但很可惜，戈鲲化三年后就谢世了。半个世纪之后才又有华人在哈佛大学讲中文。

总起来看，在容闳出国前的几十年间，美国人虽然对中国文化有所涉猎，但仍是隔着云雾观景，不识庐山真面目。中国对美国的了解也大体如此。

据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文献资料来看，中国人最早关于美国的记载是谢清高的《海录》。谢是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18岁（1782年）起，就随外国船只飘洋海外，大概在32岁时双目失明，返归故里，结束了风风雨雨的颠簸生涯。1820年，杨炳南在澳门遇到了谢清高，详细记述了谢讲的海

上见闻，后整理成书，名《海录》。书中记述了世界几十个国家，把今天的南洋群岛称为“南海”；把印度和印度支那半岛称为“西北海”；将欧洲、美洲、非洲称作“西南海”；将美国称曰“芋里干国”。此后一个时期，中国人多这样称呼美国。19世纪30年代后，关于美国的记述增至十余种，称谓也出现了“米利坚”、“米里干”、“花旗”、“亚墨里驾花旗”等。叶钟进在1834年写的《英吉利国夷情记略》，在主要评述英国的过程中也涉及到美国，称其“沃野宜五谷，周亦数千里，人勤力作，常以余粮济各国。……其人重行谊，无梗化，无催科，有军事，方治赋。”^①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反侵略的强烈爱国愿望推动下，先进的中国人迫切了解世界，对美国的探讨也略微深入了一步。1842年，林则徐主持编辑了《四洲志》，关于美国的部分有两万多言，甚至讲到了美国的议会制，对其“总无世袭终身之事”的总统选举制，流露出了欣赏的情趣。魏源的不朽名著《海国图志》，也十分重视对美国的叙述，而且画有草图。在魏源眼里，美国一是“富”，“每年物产及制造货件，共银一亿一千万元，可观其国丰盛矣”；二是“强”、“其水师武备甚善，屡与英国交锋获胜”；三是“公”，“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以二，舍独徇同。”^②美国简直成了魏源理想中的“西土桃花源。”较《海国图志》稍后一点出版的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也对美国推崇备至，还用优美的笔调第一次

① 转见魏源：《海国图志》卷五二。

② 参见《海国图志》卷59、60、61。

向中国人介绍了华盛顿，其云：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乎天下为公，曩曩乎三代之遗志，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伟绝伦。呜乎，可不谓人杰矣哉”！^①

这里把华盛顿比作中国历史上的陈胜、吴广、曹操、刘备，又实现了中国人向往的“天下为公”的美妙社会蓝图，徐继畲的思想情绪是深沉和耐人寻味的。特别在鸦片战争时期那种特定的年代里，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世界和美国缺乏起码的知识，徐继畲这种介绍就具有开阔视野的启蒙作用。

但是，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人一不懂英语，二无法出国，他们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外国人办的一些报刊杂志、传教士的口头叙述以及很少的中文图书，其中半是传闻，半是臆测，具有猎奇性质，片面和不准确是难免的。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实际正处于“瞎子摸象”阶段。时人评论清廷的“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②中美在1844年已订立了《望厦条约》，但道光皇帝还怀疑世界上有一个美国存在，让臣下去查一下“是否确实”。^③这种无知状态，不仅有碍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而且有害于外交和反抗资本主义的侵略。所以，沟通中美文化在当时是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的一个大问题。容闳的赴美，恰与此紧密

① 《瀛环志略》卷九。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二册，第412页。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四，第2921页。

地联系在一起了。客观形势决定了他的先驱者地位。

5. 扬帆赴美

1847年1月4日，容闳、黄胜、黄宽和布朗夫妇搭乘美国阿立芬特兄弟公司（The Olyphant Brothers）来华运茶的商船，扬帆赴美。

船由黄埔港起航，顺珠江口前进。容闳兴奋异常，一会儿和黄胜指着大虎山、小虎山说笑，一会儿和黄宽遥望大角、沙角炮台谈论。刹时间船出虎门，容闳向西望去，澳门、婆罗岛隐约出现，容闳仿佛看见了绿树环抱的南屏村和双泪俱下的老母亲。当容闳沉思之余，船已穿过伶仃洋，驶进波涛汹涌的大海。遥望万顷碧波，容闳心中浪花鳞起，思绪万千。他思念着生他养他的老娘，回想着颠沛困苦的童年，幻想着自己将来“美妙”的前途。当他转头看见同船而行的布朗先生，心里又泛起了感激之情。

是布朗让他受到了小学教育，学到了知识；是布朗带他往美国去，并通过香港的几位老板为他解决了去美国上学的两年经费问题，同时还资助了他家一些钱。

不用说容闳对布朗这样的传教士感恩戴德，就是缺少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看了这些也会困惑不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慷慨解囊？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为了侵略中国，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十分注意文化侵略，“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

就服从他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①美国对文化事业最为重视，培养传教士和吸引留学生是其一贯政策，不惜在这方面投资大批金钱和人力。1834年美国伯驾牧师（Rev. Peter Parker）曾在广州开办眼科医院，“用刃针来开放中国”。^②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起了决定性作用，美国通过这个条约获得了在中国的一系列特权。1858年美国公使列卫廉（W. B. Reed）在给美国国务卿的信中讲：“传教士及与传教运动有关系的那些人，他们所作的努力，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若没有他们充当译员，公事就无法处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这里就简直无法履行我的责任。”^③美国公使田贝（Denby, C）也说：“这些先锋队（即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④这充分说明传教士拿出一些钱来办学校、开医院，根本目的是网罗信徒，奴化人民。他们知道培养一个中国信徒，比十个外国传教士的作用还要大。办医院、办学校、吸引留学生这些“慈善事业”起着征服人心、培养信徒的作用。这是布朗资助容闳的主要原因。当然，传教士搞的这些“慈善事业”在客观上为中国人民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提供了方便和可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二卷，第593页。

② 转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06页。

③ Tyler Dennett: 《American in Eastern Asia》，纽约1922年版，第556页。

④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二卷，第252—253页。

能，不少人是在和传教士交往中学到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将西方的许多科技、政治书籍翻译为中文，许多跟传教士一起活动的中国人并没有按传教士的意愿发展下去，而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拯救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布朗虽然希望容闳将来能继承他的事业，但容闳并没完全按他指引的方向走下去，而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道路。

容闳所乘的船越过我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后，直奔马六甲海峡，准备绕好望角，越大西洋，直趋纽约。时值寒冬，北风怒吼，船在波浪中跳跃。几十年后容闳仍记得当时的情景：船“过好望角时，小有风浪，自船后来，势乃至猛，恍若恶魔之逐人。入夜天则黑暗，浓云如幕，不漏星斗，于此茫茫黑夜中，仰望桅上电灯星星，摇荡空际，飘忽不定，有若墟墓间之磷火，此种愁惨景象，印入脑际，迄今犹历历在目。惟彼时予年尚幼，不自知其危险，故虽扁舟颠簸于惊涛骇浪中，不特无恐怖之念，且转以为乐，竟若此波涛涌入予目中，皆成为不世之奇观者。迨舟既过好望角，驶入大西洋，较前转平静，至圣赫勒那岛(Saint Helena)，稍停装载粮食淡水。”^①

圣赫勒那岛是拿破仑失败后被流放的地方，拿破仑最后亦老死于这个小岛上。容闳等人借船装水运粮之时上岛游览。他们走到拿破仑墓前，抚今追昔，怅触于怀，各自抒发观感，评论得失。墓前有棵大柳树，各人手折一枝，妥为保存，准备带往美国，灌溉栽培，以为永久之纪念。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2—13页。

船过圣赫勒那岛后，向西北而行，遇海湾水溜，水急风顺，舟去如矢。1847年4月12日，容闳经过98天的辛苦奔波，终于到达了纽约。

当时的美国雄姿勃勃。美国自1783年获得独立后，逐步由一个被侵略国家变为向外侵略扩张的国家。19世纪开始的50多年中，其领土增加了两倍，由一个大西洋沿岸的国家变为西滨太平洋东临大西洋的大国，占去北美洲大陆的几乎一半。而且这片土地资源丰富，气候适宜，为其生产发展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美国的人口也在这期间由530万增加到2300万以上，为发展生产准备了劳动力。同时当时握有政权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为了牟取暴利，急剧要求发展生产。所以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工农业生产突飞猛进。轻工业发展尤为迅速，布匹在国际市场上已开始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竞争。铁路发展也很快，1850年铁路线长达15000公里，居世界第一。农业机械的生产也超过了欧洲各国。总之，美国犹如一只初生之虎，雄视全球，已开始和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竞争。但美国毕竟是后起之国，还远比不上英、法等国强盛。容闳第一次见到的纽约是人口仅有二、三十万的发展中城市。

容闳在纽约稍作停留，就乘船赴纽黑文(New Haven)，然后到达布朗先生的家乡东温若(East windsor)。布朗的父亲是东温若教堂的牧师，是一位虔诚的清教徒。他异常严肃，从不谈笑，每天一早起来祈祷，然后宣讲圣经，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偏废。他的信徒很多，家中宾客如云。容闳一到他家，就被领入教堂，随教徒祈祷。教徒们见这位中国人

也信奉上帝，一齐投来惊奇的目光，连牧师的宣讲也充耳不闻了。

在布朗家住了一星期，容闳即往马萨诸塞州 (Massachusetts)，进入孟松学校 (Monson academy) 学习。开始容闳食住在布朗家，日往学校上课，后来布朗家住房发生困难，就在布朗家的对面赁了一间小屋，让容闳居住。容闳当时虽然有传教士们资助的钱，但远不够用。因此他除上学外还要作小工，帮人洗衣服、拉煤球，赚点零钱，维持生活。他黎明即起，洒扫清除，生火做饭，在忙乱中奔向校门，过着艰苦而紧张的学习生活。

孟松学校是一所初级中学，当时美国尚没有高中，凡准备升入大学者均往此类学校学习，作为预备。学校设有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哲学等课。当时的校长是海门先生 (Rev. Charles Hammond)，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是较有名气的教育家，夙好古文，擅长英国文学，尤其喜欢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的作品，同时注重教学法，善于演讲，有一套教学经验，深为容闳所敬重。在海门的影响下，容闳对英国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英国著名作家的许多文集他都看过，还学了一些哲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在他头脑中开始生根。

转眼间一年的学习生活过去了，按传教士拟定的资助容闳学习两年的计划马上就要到了。1848年秋，容闳同行三人中的黄胜病重，不能坚持学习，提前归国。余下容闳、黄宽二人日夜商讨期满后如何办的问题。两位在孟松学校的学习刚刚入门，迫切想多学点知识，不愿归国。但是经费怎么办

呢？靠做小工，赚钱甚微，不行；靠传教士帮助，期限已满，不行；靠自家资助，一贫如洗，不行；二人找不到出路。不得已，容闳和黄宽请布朗、海门先生帮助解决。海门、布朗即致函在香港的几位英国老板，请求资助，最后复信答应容闳、黄宽在孟松学校学习期满后往英国苏格兰省爱丁堡大学学习专科，经费由他们资助。容闳得信后，仍不如愿；因他这时一心想投考耶鲁大学，对往英国学习专科毫无兴趣。而黄宽则转忧为喜，愿意前往，1849年于孟松学校毕业后，即妥备行装，启程往爱丁堡大学。留下的容闳陷入了无限苦闷之中。

6. 容闳的两名同学

在叙述容闳如何排除苦闷之前，有必要简略介绍一下他的同学黄胜、黄宽后来的情况。因为一则“二黄”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中都有自己的特殊贡献；二来也可以和容闳作一比较，加深理解容的思想 and 行动。

黄胜比容闳大三岁，1848年因病返国后流落香港，先在德臣西报（China Mail）从事印刷工作，博得微资。不久即进入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印刷所专门从事印书工作。英华书院是马礼逊在1818年创办的，先设于马六甲，1843年迁往香港。该书院从传教的目的出发，将圣经译为中文，广为印刷，也印一些沟通语言的工具书和中文典籍的英译书，所以在客观上不无一些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黄胜在英华书院一方面从事印刷出版业务，一方面帮助

该院院长理雅格 (James Legge) 将“四书”译为英文。由于黄胜中文、英文皆通，帮助理雅格攻克了不少难点，还校对出了许多不应有的错误，所以理雅格十分感激他。在王韬^① 1862年来港之前，黄胜是理雅格翻译中国文化典籍的唯一助手。1860年，黄胜在取得印刷和出版经验后，创办了香港第一家中文报纸《中外新报》^②。既有各种新闻报道，又译载英文报刊的消息和商业广告，颇受欢迎。从此，黄胜小有名气。1864年后，洋务派的头面人物李鸿章、丁日昌^③ 先后致函，邀请黄胜往上海参与办洋务。不知何因，黄胜都谢绝了。但他对制洋枪、洋炮很感兴趣，陆续翻译了“炼铁、造模、置炉、钻炮、验药”等方面的英文图书，并附有“测量各表”和“枪说”^④。他很想把这些资料提供给洋务派官僚，但他的中文水平不高，不敢致函李鸿章。恰好，这时他结识了逃来香港的大才子王韬，遂由王代笔，以黄所译资料为素材，写了一篇洋洋洒洒、议论风生的洋务文章，起名《火器略说》，用黄胜的名义函呈李鸿章和丁日昌。李、丁对这篇论说的反映如何，并不清楚，但这时李鸿章在上海办起了新式外语学堂——广方言馆，苦无教员。于是，由丁日昌出

① 王韬，号仲弢，江苏吴县人，1828年生。中秀才后，屡试不第。后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往欧洲观光学习，思想大变。返国后在香港、上海等地活动，写文章批评时政，要求变法，颇有影响。1897年病逝。

② 一说为伍廷芳所办，但伍此时刚十八岁，恐无此力量。也有可能是黄胜和伍廷芳合办。

③ 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1823年生。思想开放，对办洋务兴趣很浓。曾任苏松太道、江苏巡抚等职。李鸿章对他十分赏识，是李办洋务的支柱之一。1895年去世，言论辑为《抚吴公牍》。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224页。

面，请黄胜前来任教。从此，黄胜近三年的时间，执教于广方言馆，为培育中国第一代外语人才做出了贡献。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很想了解世界的地理、历史和现状，就致函黄胜协助翻译，并想让他当自己的参谋。但黄婉言谢绝，而推荐王韬代己出任，从此王和丁为莫逆之交。1871年，英华书院因故停办，所属印刷所的设备也将变卖，这些机器一部分被总理衙门购去，安置于北京的外语学堂——同文馆，作为印书之用，黄胜曾亲自将机器押运北京。另一部分则由黄胜和王韬联合买下，新开了一个中华印书总局，以最先进的设备排印图书。他们印的邝其照的《华英字典》、湛约翰的《英粤字典》、王韬的《普法战纪》等书，在早期中外文化交流中起过较重要的推进作用。

1873年，大概是受容闳的邀请，黄胜出任留美幼童肄业局的委员，并带领第二批幼童赴美，协助容闳推进“留美教育计划”。此后，黄胜一度回国，协助福州船政学堂从香港招收学员，对这所学堂的顺利开办大有裨益。1878年，他又一次赴美，任清廷驻美使馆的翻译，但受到清廷驻美公使陈兰彬的攻击，工作很不顺利，1882年辞职返香港。晚年，他加入了英国籍，在香港知名度很高，曾任香港法院的第一位华人陪审员、东华医院的董事、考试署华人事务所的委员、香港立法局议员等职。1902年与世长辞，享年77岁。

黄宽比容闳小一岁，他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专攻医学，于1855年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学习解剖学和病理学，获硕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英国医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这时，爱丁堡大学出现了一股利用医学往各地传

教的热流，还组织了爱丁堡医学传道会(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准备往叙利亚、中国等亚洲各国传教。黄宽一方面受此影响，更重要的是试图用他学到的知识为中国人治病，于是在1857年回华。他先在香港一家医药局作短暂停留，即往广州行医。此时，除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设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和建眼科医院外，英人合信(Benjamin Hobson)也主持建立了惠爱医馆(Missionary Hospital at Canton)，有五十张病床。同时，合信等人一面编译了一些西方医学著作，如《内科阐微》、《割病全书》、《西药略释》等，是最早介绍西方医学的启蒙读物；一面又组织了训练班，吸收个别中国青年学习，充任助手，黄宽本想与他们合作，推进西医在华传播。但由于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连惠爱医馆都遭到了破坏。因此，黄宽先是在广州府学东街开办了一所医药局，悬壶治病；接着将惠爱医馆修复，主持开业。在这个医馆，黄宽曾首次作过难产截胎手术，令人惊叹不已。1863年前后，黄宽曾充任李鸿章的幕僚，但他厌恶官场生活，又辞职回广州自由谋生。恰好美国传教士嘉约翰(John G. Kerr)在广州开办了博济医局(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s Hospital)，同时办起了医学训练班，人手奇缺，就请黄宽帮忙。黄宽用其广博的医学知识，在训练班讲授生理、解剖、外科学和临床学，嘉约翰讲药理、化学，另一名华人医生关亚杜教中医学。这是中国最早的较正规的业余医学堂，具有开创意义。黄宽还用他精湛的医术为病人治病，他做过三千多次膀胱结石手术，都获得

成功；他在1867年嘉约翰回国的九个月中做过十七个结石手术，并治好了许多病人，同时主持博济医局的医疗和行政事务。此时的黄宽已名声卓著，容闳讲他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博济医局也有较大发展，1867年住院人1000多，门诊56000多人。该局举办的医学训练班后来发展为博济书院，孙中山也曾是这里的学生。

黄宽晚年，兼任广东粤海关的医官，每年要写一份详细的有关当地病情的报告，上交海关总税务司，集为《海关医报》(Medical Reports of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出版。黄宽汇集的关于牛痘和霍乱发病情况的报告，颇受人们重视，著名医学专家伍连德著的《中国医史》曾加以引用。1878年，黄宽病逝，终身未婚。在近代中国医学史上，尤其是西医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黄宽是屈指可数的有重要贡献的人物之一。

但是，和容闳相比，黄胜、黄宽的贡献仅局限于某个具体事件和一些特定的领域之中，对中国的全局影响较小，其历史地位就受到了限制。而容闳较他们看得远些，能触及到独立、富强、改革这些近代中国带根本性的问题，其影响就较黄胜和黄宽大，其思想和行动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追根寻源，这是和容闳在耶鲁大学留学时所形成的世界观和中西文化观紧密联系在一起。

7. 留学耶鲁大学

容闳进入耶鲁大学的时间是1850年，中间有许多想象不

到的周折。

黄宽往英国走后，容闳虽然朝思暮想投考耶鲁大学，但经费问题仍无法解决。不过他并未灰心丧气，加紧复习有关科目，四处联系，求人资助。1850年元旦来到后，经费问题仍无着落，他有点茫然了，只好再求海门、布朗帮助。海门告诉他：“孟松学校定制，固有学额资送大学，盖为勤学寒士而设，汝诚有意于此，不妨姑试之。第此权操诸校董，且愿受其资助者，须先具志愿书，毕业后愿充传教士以传道，乃克享此利益。”^①容闳一听要做传教士，爽然自失，默不作声。海门不解其意，以为容闳同意了，转告诸校董，校董随即送来志愿书，请容闳填写。容闳婉言谢绝。其原因有二：

其一，容闳时值22岁，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富有抱负和理想，他准备选择一最好的职业，将来归国后有所作为，即使中国政府不录用他，他也能造成一种势力，对改造中国和“拯斯民于水火”作出点贡献。尤其当他在孟松学校接触到一些英国文学和哲学等社会科学后，当他亲身体验和观察了两年美国的社会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产生了兴趣。如果他填写了充当传教士的表格，他就失去了今后选择职业的自由，“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②

其二，他认为传教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诚然，他并没有认识到传教是资本主义列强的一种侵略手段，但他感

① 《西学东渐记》第22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3页。

到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各种信仰千奇百怪，而且许多人本来就无所谓宗教概念，基督教根本不可能统治中国人的思想。即使有的人一时信了教，但用不了多久就如春冰遇旭日一样，顷刻化灭。所以容闳认为传教在中国并不是什么前途光明的职业。因此，容闳虽然急于谋求援助，却仍然谢绝了校董们希望他当传教士的要求。

这样，容闳简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不料，1850年的夏天，容闳却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当时布朗先生往美国南部探望其姐，顺道访问了乔治亚省萨伐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 Ga.），其中谈到了容闳上学的经费问题，博得了该会的同情，同意拨出少量钱来资助容闳上大学。容闳得此消息后，欣喜万分，加紧复习功课，终于考入了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历史悠久，设备完善，图书丰富，教师力量强，为容闳的深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学习刻苦，行动老成，还喜欢体育运动。对于足球，他有一种特殊的爱好，经常参加学校的足球比赛。他身着中国服装，头戴瓜皮小帽，把那根讨厌的辫子盘在小帽底下，东冲西挡，惹得围观的美国同学捧腹大笑，把他视为传奇式的足球英雄。胡适留美时曾到一位和容闳同过学的白博士家做客，这位白博士讲：“60余年前，……与容纯甫同学，容异服异俗，颇受人笑。”^①但是，容闳并不注意这些，一心扑在学

① 《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914年5月15日记。

习上。这是因为，一来由于他没受过各方面的专门训练，基础较差；二来妇女会所资助的费用有限，还得忙于做小工捞点钱，费去了不少时间。所以后来他很少再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天读书至半夜。同时自黄宽走后，他无法见到中国人，汉语逐渐退步，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又寄信给香港的威廉士牧师，请他寄来几本汉文书，抽空攻读，这又加重了负担。长此下去，容闳由于用功过度，身体瘦弱，后来不得不请一星期假到东温若布朗家乡休息。升入二年级后，容闳在学习上仍然困难重重，尤其是微积分，他根本不懂，每次考试很少及格。长此下去，未免会受到留级的惩罚，容闳非常担忧。幸亏他的英文基础好，这样一平均，还勉强能及格。耶鲁大学的计分标准是，平均（2）为及格，平均（3）为荣誉级。容闳在一年级的成绩是，第一学期平均（2.12）；第二学期平均（2.45），逐步有所进步。到三年级时，他学习入了点门，英文成绩连获首奖，在校同学皆侧目而视，但容闳不敢自鸣得意，因那门讨厌的微积分仍没有过关，经费困难又时时向他袭来。为了克服经费困难，容闳积极在学校谋求职业，第三学年时高年级同学二三十人自办伙食，容闳就自报奋勇去充当他们的司务长，晨起为之采购蔬肴，饭时为之供应左右，博取几元钱，可供容闳吃饭费用。与此同时，学生中还成立了兄弟会等小团体，自备有图书室，容闳就自我推荐充任他们的图书管理员，每月可拿30元钱。由于容闳热情负责，第四学年兄弟会仍一致推他任管理员。这样，容闳一方面解决了后顾之忧的经费困难，一方面有机会博览群书。到1854年毕业时，容闳各门功课都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获文学士学位。1876年耶鲁大学又授于他法学博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个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中国第一位学士、博士。

8. 西学东渐思想的形成

八年的留美生活在容闳的一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容闳在此期间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文化，成长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他正值19岁到26岁，是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没有这种客观条件，容闳不可能成为一个新人。

思想是客观社会存在的能动反映。容闳来到美国后看的是资本主义的社会，接触的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就的各类人，过的是资本主义式的生活，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这样的社会实践对于容闳这样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会起很大的思想转化作用。况且容闳的生活经历是由一个毫无生活保障的穷孩子在传教士的资助下变成了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的大学生，这对其思想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容闳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兴盛时期，他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是美国最早的工业区，各种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使容闳赞叹不已。容闳本来就极度崇拜西方文明，他在美国接触到的又主要是教育界人士和传教士，所以他根本不可能认识美国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发展中所出现的经济危机。他看到美国的一切都好，美国资本主

义式的社会成为其理想中的“天堂”。随着容闳的大学毕业，美国式的社会制度、生产发展、生活方式、思想文化在其头脑中形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

但容闳毕竟是一个中国人，其少年时期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不会忘记南屏村的山山水水，不会忘记当地官吏的横征暴敛，不会忘记家乡人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不会忘记他提篮沿街叫卖的情景，更不会忘记他往稻田捡稻穗的日子。这又是其思想形成的又一种社会实践。容闳说过，当他大学将毕业时，“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于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①

美国的繁荣，中国的腐败，两种客观现实印于容闳脑中。容闳向往美国的富强，痛恨中国的腐败，当然渴望自己过上美国式的富裕生活。而且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他大学毕业，有专业特长，又认识一些神通广大的美国人，选择一个颇为理想的工作，是轻而易举的。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挽救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十分了解容闳的吐依曲尔牧师（Rev. Joseph H. Twichell）讲到容闳当时的处境时称：

“容闳毕业时受到了莫大的劝诱，让他改变终生的打算。他居留美国已久，具备彻底归化的资格。事实上，他已经是美国公民。他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感情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而且，由于他的毕业引起人们的注意，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机会向他开放了：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中国反倒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6页。

象异乡，他连本国语言也几乎忘光了。而且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给他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立足之地。不仅如此，而且考虑到他在哪里呆过，成了什么人，想要干什么，他在中国人当中不可能不受到歧视、猜疑和敌对。摆在他前面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回去的想法就是去异乡流浪的想法。他非常想留在美国。但是他说，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就象上帝的声音似的在他耳边萦绕盘旋。那条经文说道：‘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认基督教，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在容闳的心目中，‘自己’、‘自家人’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得胜了。他活象是从整个民族中选拔出来领受这份恩泽似的，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图利自私。所以，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头上，他还是决心回去。”^①

这里把《圣经》中的一句话作为容闳要归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夸大其辞，但所揭示的容闳在平坦、幸福与坎坷、困苦的两条道路的选择上，毅然要走后一条道路时的情形，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容闳进入耶鲁大学后就决心将来毕业后为祖国贡献力量。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无论他大学毕业后选择哪一种职业，都应具有“为祖国谋福利”的价值。开始他感到中国以农立国，但农业并不发展，这样中国就不可能强盛，所以想攻农业化学。后来他又想学医学，用

^① 转见《西学东渐记·代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先进的内科、外科医术为中国人解除痛苦。^①到1854年大学毕业时，他又形成了新的救国方案，即通过留学教育，达到西学东渐，使中国文明富强。因为容闳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通过派人到美国接受新式的资本主义教育，是培养新型人才的好方法，他自己就是走这条路而转变为新人的。如果让中国政府派更多的人到美国学习，就会涌现一大批掌握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进人才，这些人就会把西方的文化传播到中国，从而改造中国，建设中国，中国不就会和美国一样的强盛了吗！这就是容闳后来归纳的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在他毕业前夕已经大致有了一个“草图”，“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Carral Cutler）的几次散步长谈中，他提出和谈论了当时正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②

容闳说：“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倖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因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旦夕图继，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划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

① 1852年12月30日容闳在致卫三畏的信（原件存耶鲁大学图书馆）中说：“如果住到1854年夏，我将获得文学士学位，此后我将考虑回国，并且仔细考虑将来的职业。谈到职业，我还没有一定的结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我将来要学习农业化学，我也许去学习内科和外科医学。有那么多东西，而且每一种都对想为祖国谋福利的人那样地具有价值，以致要想知道应该选择哪一种实在是太困难了。”可见容闳在选择职业上是颇费心机的。

② 《西学东渐记·代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

以教育为手段，西学东渐，使中国富强，这就是容闳1854年大学毕业时的政治抱负。这种政治主张既不同于广大农民群众揭杆而起要求推翻清政府的农民大革命，也不同于后来孙中山领导和发动的旨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和康有为、梁启超在戊戌变法时要用君主立宪去代替封建专制的改良主义相比较也有一定距离，它是希望通过教育来改造中国，从而使中国强盛起来，是一种资产阶级“教育救国论”。这种主张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在当时中国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外有资本主义列强的蚕食鲸吞，内有封建专制的严密控制，单靠兴办资产阶级式的留学教育是不可能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祖国腾飞的。因而具有空想性。但是，另一方面，要完成对外反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实现民族独立；对内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建立先进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发展新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经济，组织适合客观要求的政治斗争。而这一切都要由一代新人，即了解世界，具有最新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来完成，这就必须搞新式教育。所以，进行“教育救国”也是一种最基础的工作。没有这种基础，就不会有生动活泼的谋求中国进步的各种政治、经济运动的展开。因此，我们说容闳的教育救国计划是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6——27页。

一种促进中国进步的爱国思想。尤为高明的是他把西学东渐落实在培养一代新人身上，把培养人才和输入西方科学文化结合在了一起，这就使西学东渐落在了实处。

9. 开风气之先

如果从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演变历史去考察，就会发现，容闳这种利用留学教育将西方文化输入中国，使中国进入文明富强之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在当时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开拓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的30年间，是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并开始走向世界的序幕时期。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腥风血雨面前，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思想政治家对传统开始了反思，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士大夫们不得不面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思考如何向“蛮夷小邦”学习，使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中立于不败之地。于是在思想界冒出了一个又一个发人深省的火花，使旧观念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缓慢地更新。以对风靡思想文化艺术界的乾嘉学派①的怀疑和批评为契机，今文经学派②蔚然兴起，龚自珍和魏源成为

① 乾嘉学派，兴起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继承了古文经学派的训诂和考证的研究方法，解释古代经义，并从事历史、地理、音律、典章制度、天文历法等方面的研究，对文化积累贡献很大。但脱离现实，不解决实际问题，为学术而学术，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② 今文经学派，兴起于汉代，和古文经学派相对立，注重从特定的现实社会需要出发，去解释古代经典，善于发议论，抒发个人政治见解。清朝嘉庆年间，一些学者不满乾嘉考据学的统治地位和钻在故纸堆里的研究方法，使今文经学派重新崛起，努力研究社会问题。到鸦片战争前后，风行于学术思想界。

两面旗帜，使经世致用思想逐步推而广之，人们开始注重研究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眼光敏锐的龚自珍看到了清廷江河日下的败局，盼望新人才的涌现，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实际并未出现任何奇才。魏源的思想较龚自珍开放得多，又具有一定的世界知识，他在宣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同时，曾建议清廷在福建、广州等沿海地方设立考“洋学”的专点，以培育新式人才。他甚至还提出在虎门附近开辟一块地方，请外人在那里办工厂，由西方科技人员向中国人传授技艺，使中国人掌握西方的“长技”，培养自己的新型人才。然而曲高和寡，从未变为现实，仅作为一种光辉的思想资料保存了下来。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由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向西方学习的“师夷长技”主张的时候，已触及到了新人才的培养问题。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是向西方学习的一种尝试，但农民阶级的意志决定了只能提出《天朝田亩制度》的治国方案，不可能出现容闳那样的使中国变成美国式的新社会那种设想。太平天国后期，从香港辗转归来的洪仁玕曾提出过一个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式纲领——《资政新篇》，但和容闳的设想有很大的差异，没有提出“西学东渐”这个在近代中国带全局性的问题。在此期间，还有一位冯桂芬^①，他是林则徐的学生，注重现实，讲求应用，在上海较早接触了一些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著有《校邠庐抗议》，呼吁改革现状和向西方学习，认

^①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序，1809年生，江苏吴县人，曾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后为李鸿章幕僚。他对现实不满，主张“采西学”，“制洋器”，1874年去世。

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①但从总体来观察，冯桂芬的资本主义思想和政治主张是支离破碎，难成体系的。和洪仁玕、冯桂芬几乎同时的，另有一位蒋敦复^②，是个穷秀才，流落上海期间接触了来华的传教士和西方文化，曾著华盛顿传和恺撒传，盛赞西方的社会民主制度。他在《英志》一书中，介绍了西方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三种社会政治体制，是近代较完整地描述西方政体的第一人。但他仍是隔岸观火，间接地耳食一点皮毛的东西，而且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一旦在中国推行，必将天下大乱。总之，魏源、洪仁玕、冯桂芬、蒋敦复等人的言行，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前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轨迹。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敏锐地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初步感觉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同时流露出了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赞美以及对清廷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但是，由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不广，他们又无法走出国门，再加上清廷专制主义文化政策的封锁，这些人的世界知识是有限的，对西方的了解是片面的，许多论述也是不成体系的。容闳由于有赴美留学的特殊机会，又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他的世界知识和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是上述诸位学者、思想家无法比拟的。在19世纪50年代，容闳是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深的一位中国

① 《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卷下，第9页，

② 蒋敦复，字剑人，江苏宝山人，1808年生，幼攻诗书，有才学。曾上书太平天国和清廷，皆不为用。后为在江苏做官的丁日昌幕僚，主修《上海县志》，著有《啸古堂文集》。1867年去世。

人。他的以留学教育为核心的西学东渐思想也是自成体系的。如果进一步考察容闳后来所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建设方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政治设想，发展教育、军事、新闻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主张，完全可以说他在大学毕业时基本接受了美国的社会政治理论和生活方式，醉心于资本主义的西方文明，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这些，在当时的中国是先进的，是破天荒的新型思想流派。因此，可以说容闳是中国近代富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晚至19世纪80年代，容闳则早于他们20多年。他的思想和行动，无疑对王韬、马建忠①、何启②、郑观应③、薛福成④、陈炽⑤、陈虬⑥、胡礼垣⑦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有这样那样的影

① 马建忠（1844—1900年），江苏丹徒人，字眉叔，早年在上海受西学影响，后留学法国。返国后大力宣传变法，著有《适可斋纪言纪行》。

② 何启（1859—1914年），字迪之，广东南海人。早年在香港就学，1875年留学英国。1882年返国后，为变法改良努力奔走，言论辑为《新政真论》。

③ 郑观应（1842—1922年），字官应，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多年在上海从事洋务企业，后著文要求改革，所写《盛世危言》一书很有影响。

④ 薛福成（1838—1894年），字叔耘，江苏无锡人。从李鸿章办外交多年，又任过驻外使节，思想开明，讲求变法，著有《庸盦全集十种》。

⑤ 陈炽（？—1899年），字次亮，江西瑞金人。做过清廷小官留心时事，参加戊戌变法，著作有《续富国策》等。

⑥ 陈虬（1851—1903年），字志三，浙江乐清人。曾中举人，但关心现实，参加戊戌变法，所撰《治平通议》一书，力主维新。

⑦ 胡礼垣（1847—1916年），字荣懋，号翼南，广东三水县人。幼居香港，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他关心清廷改革，著文批评时政。论著辑为《胡翼南先生全集》。

响。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①在英国时，就曾和容闳多次书信往来，郭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受到了容闳的启迪。所以，从近代资产阶级新思想跳动的脉搏去分析，容闳有承先启后的功用。

但是，容闳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想是植根于美国的社会文化土壤，和中国的社会实际不免有些脱节，超越了当时中国的社会进程。而容闳头脑中“西学”多，中国文化少，尤其对中国社会认识肤浅。所以，他的言论就不如王韬、薛福成等人深刻，他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影响也赶不上他们，只能算这支队伍中的末流。客观地讲，容闳有开风气的启蒙作用，却没有成为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这是由客观社会条件和容闳本人的思想特点所决定的。这在我们后面的评述中还将进一步阐明。

① 郭嵩焘（1818—1891），号筠仙，湖南湘阴人。曾任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等官，出使欧洲后，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曾遭顽固派猛烈攻击。著有《养知书屋遗集》等，近又出版了《郭嵩焘日记》，史料价值很高。

三、为西学东渐奔忙

1. 返回祖国

容闳性格坚毅，富于自信和奋斗精神。他既然确立了以留学教育为中心的救国理想，当然就百折不挠地奋斗下去。本来在耶鲁大学毕业前夕，他曾在该校新设立的雪费尔专门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学习测量专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想进一步深造。但为了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迅速变为现实，他急切想返回祖国。于是在1854年11月13日，由纽约乘乌热卡号（Eureka）轮船归国。时值寒冬，旅途上狂风大作，波浪冲天，帆船如沧海一粟，飘流不定，足足行了154天，才到达我国南海海面。

1855年3月15日，帆船驶进了伶仃洋，香港、澳门时隐时现，容闳站在船头，极目眺望，离别八年的祖国变成什么样了呢？

比容闳想象的要坏。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日益向半殖民地深渊沉沦。

随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①五口的开放，成千上万只英、美商船满载鸦片、洋货而来，中国的白银泄洪般地外流。英美等国廉价的工业品排挤着东南沿海传统的手工业和小商业，使大批手工业者作坊倒闭，日无生路。纺织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江苏太仓、松江一带甚至出现了“无纱可纺”的局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②西方殖民者不仅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和洋货，而且展开了掠夺中国人口的罪恶活动。他们公开在厦门设立掠夺“华工”公司，流窜于广州、澳门、香港、汕头、南澳、宁波、镇海、吴淞、上海拐卖中国“苦力”。据英国驻广州领事阿礼国（Alcock Rutherford）供称：“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要人们离开自己的住宅，那怕是走到通衢大街，谁也免不了有被人假借债务纠纷或私人嫌隙推架而去的危险。这些人被绑匪带去，就成为囚徒，按每头若干价钱被卖给苦力承包人，运出海面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广州城和邻近各地的全体人民中，已经掀起一种滔天大难的感觉。”^③李东沅在《论招工》一文中也记载说：“粤省拐匪先与洋人串通，散诸四

① 这五口开放的具体时间是：广州，1843年7月27日；厦门，1843年11月2日；上海，1843年11月17日；宁波，1843年11月27日；福州，1843年12月19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4页。

③ 转引自《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5页。

方，投人所好，或炫以资财，或诱以阉睹，一吞其饵，即入牢笼，遂被拘出外洋，不能自主，又或于滨海埔头，通衢歧路，突出不意，指为负欠，牵扯落船，官既置若罔闻，绅亦不敢申诉，每年被拐，累万盈千，其中途病亡及自寻短见者不知凡几，即使抵埠，悉充极劳苦之工，少惰则鞭挞立加，偶病亦告假不许，置诸死地，难望生还。”^① 据统计，1858年以前被掠夺的“华工”即达15万人。中国人民已经到了连性命都很难保障的地步。

与殖民主义者互为表里的是清政府的横征暴敛。为了偿付鸦片战争后的大量赔款，清政府巧立名目，乘机向人民豪夺，贪官污吏也借机盘剥，流亡饥民比比皆是。有人深刻揭露当时的社会状况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② 加上从1846年到1850年的五年中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直隶五百多个州县连遭水、旱、风、沙、雹灾；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遭受特大水灾，连武昌城都一片汪洋，各行店尽成水府。人祸加上天灾，出现了“村村饿殍相枕藉，十家九室无炊烟”的悲惨局面。^③

人民走投无路，只有揭杆而起。鸦片战争后的数年间，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达一百多次，终于酿成了声势浩大的太

①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八六，第4页。

② 《王大洪告示》，《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15页。

③ 金甌：《米贵谣》，《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10页。